**history/历史(Lì Shǐ)**

|  |  |  |
| --- | --- | --- |
| Chinese Perspective | ZHAO Tingyang | 17 Feb 2022 |

1. 一个用于表述“事”（event）和/或“史”（record）的字

在汉语中，“历史”这个词的本意是“事件”（event）和/或“记录”（record）。在最早的文本中，严格说来，这个词可以理解为用一个字表达两种涵义，或者是两个字但同一个读音：“事”和“史”。两字同音似乎形成了一个隐喻，暗示事和史本为一物，就是说，事情有事功才是重要的，于是，事功才值得被记录。这说明了一个关于历史的真理：事仅存在于史之中，不被记录的过往不是事，或者说，历史的事是人之所见，并非发生之所是。关于历史，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是否存在一个对所有人都具有同等意义的历史？

如果要举出一个文化间误解的典型案例，我愿意说是历史。在思想中，或许可以构想一种属于全人类或全世界的普遍历史概念，但这只是理论设想，实际上被书写出来的历史，几乎都是讲述某个民族或某个文明的历史，其他事情只是相关项。这种建构了某个民族或文明的画像的历史叙事，多少类似于一个人的自传。正如没有谁会完全相信别人写的自传一样，除了怀有专门分析兴趣的学者，也没有多少人真的对他者的历史感兴趣，除非与自己的历史有关。即便对其他历史有所了解，外人眼中的历史也与本民族所接受的历史大不一致。关于历史问题，很少有共识。

这个问题与关于历史真理的知识论无关，而是反映了文化与政治承认的难题。其实，历史包含的真理要远远少于人们的预期，因此，研究真理的知识论并不能充分表达和解释关于历史的问题。事实上，即使以探求真相之名，历史也更多是诉说了关于某种命运和精神的故事，解释了某个民族或文明的建构性的来龙去脉，即我称之为“历史的历史性”的那种建构性。由于对事件和事功的重要性怀有相异的看法，不同的历史性有着不同的文化变量，历史的概念也就是各不相同的复数。我承认，我对历史的理解比较保守，与现代的进步史观、当代的全球史或世界史视角相去甚远。不过话说回来，真正的**世界**迄今为止还没有存在。

1. 以历史为本的文明

历史学家章学诚（1738-1801）在发挥他对中国文明的一般性诠释时，提出“六经皆史”的说法[[1]](#footnote-1)。这个说法得到了广泛认可，被认为是对中国思想的一个最好的解码方式。所谓“六经”，即是《易》、《书》、《诗》、《礼》、《乐》和《春秋》（这是历史记录的最早通用名[[2]](#footnote-2)）。六经创作于公元前4世纪以前，部分内容甚至早至公元前12世纪，它们就像《圣经》之于西方思想一样奠定了中国思维方式的基础。如果按照现代分类学来看，《易经》讨论了哲学，《尚书》是政治观念，《诗》当然就是诗歌，《礼》关注的是伦理和社会规范，《乐》研究的是音乐和歌舞（这本已失传），而《春秋》则是第一部编年史（从公元前722年记录到公元前481年）。章学诚另有深层发现，他将历史视为六经的“本质”或密码，指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3]](#footnote-3)。这意味着以史言理，而非以理言事。章学诚准确地把握住了中国思想的重经验实践而轻先验逻辑的思维特征。

沿着他的思路，我想可以说，中国文明的根基正是历史。这在结构上不同于那些以宗教为本的文明，或以哲学为本的古希腊文明，或以法律为本的古罗马文明，也不同于基于个人主义的现代文明。不过犹太文明似乎更为独特，它的基础是历史和宗教的合一。

1. 历史何以成为中国文明的根基

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早期历史上的一次文化改革，即约4500年前的“绝地天通”事件[[4]](#footnote-4)。中国先民曾经如此热衷于巫术占卜，以至于百姓对巫术的热爱超过了劳动。由于人人成巫，秩序混乱，帝王颛顼对此很不满，决心重建社会秩序和宗教权威，于是颁布法规禁止地上的人擅自与上天建立联系。宗教因而被确立为帝王的特权，并且只能由官方权威加以阐释。一些现代历史学家认为，这次文化行动破坏了从巫术自发演化为真正宗教的社会条件。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说，“绝地天通”事件导致中国很早就开始了世俗化。

在此之后，官方巫术逐步走向职业化和专业化，对巫术占卜的研究和实践经验都详细地记录。根据殷墟的考古发现，几乎90%以上的甲骨文所记录的都是占卜事务的经验，这种记录已经显示出最初的历史性，就是说，历史性的思维通过“历史性的”占卜记录潜入到了中国人的精神意识之中。

不过，人文主义真正成功地替代巫术宗教的地位要到在公元前11世纪之后，决定性的事件是敬德惠民的周武王击败了极重祭祀神明、敬天不辍的商纣王。周人目睹了商朝并没有因为占卜最勤而且祭祀最隆而得到上天佑护的回报。显然，商的覆灭证明了巫术占卜的无效，这激发了周人去构建一种人文主义的新理论，其中关键转变是将天意伦理化，并将德行的价值置于祭祀之上。于是，总结政治、经济与治理经验的记录被认为是更有教益的，历史经验意味着更有实用性的“教训”。这个良好论证的人文主义终于在根本上切断了发展宗教的进路，并将历史思维确立为中国精神世界的根基。

1. 何种事件算是伟大变革？

在一个以历史为本的文明的思想观念中，行动的分量重于言辞，经验的内容多于理论。用哲学化的语言来表述，即是“**作为**”（facio）高于“**思想**”（cogito），而且，**作**理所当然地包含了**思**。一个基本理由是，没有变易就没有历史，而**作**是导致变易的始因。毫不奇怪，作为六经之首的易经发展出来的正是关于变易的哲学。考虑到易经的基本观念形成于公元前12世纪，它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历史哲学理论。按照章学诚的理解，它甚至还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的史书，它记录着上古先人创制历史的“伟大”事件。

现在，第三个问题是，何种事件可以算作是伟大变革？中国的历史哲学在考察事件时，通常会在两组概念里来协同地理解历史性，即“作”与“述”、“古”与“今”[[5]](#footnote-5)。时间是变化着的流逝过程，历史却是确立意义的事件变化——意义以“创造”（creations）为根据——但与上帝的创世无关，而是指人类做出来的那些改变生活形式的突破性创制，也就是存在秩序的设立与新事物的发明。在一些古老文献中，比如《易经·系辞下》和《世本·作篇》，列举了公元前12世纪以前的伟大发明，比如农具、轮子、渔网、舟船、制布、兵器、房屋、天文历法，等等。还有一些更重要的最伟大的发明，比如文字和政治制度——但没有提及宗教，这说明中国的历史概念有些倾向于实用主义，甚至没有提到被认为是助推中国发展出集体性社会的治水工程——这一点确实奇怪，难以给出合理解释。也许早期历史学家忽视了水利工程技术的重要性？不得而知。有些遗漏不重要，要点在于，只有那些引发伟大变革之“作”才被认为是值得被“述”的。

在孔子的时代（前551-前479），中国正在经历一次根本性的转折：从维系了1300多年的“三代之治”（夏、商、周），转向霍布斯式的纷争世界。孔子在乱世现象背后看到了发生在深层的渐微而重大的变化，一种从未有过的而对政治、社会甚至文明的概念和体系会造成巨变的隐蔽变革，孔子称之为“礼崩乐坏”，并且看出，一些事情表面上是小事，却会有深远的严重后果。

正是这种新的变革引出了对历史概念的重新定义。在孔子之前，历史一直用来记录那些有着秩序立法之功和技术发明之功的建设性或积极的事件。然而后来社会却发生了一些破坏秩序的事件，摧毁了“效法天道”的人道礼仪秩序，在实际上将原本与天道一致的历史改造为非历史。孔子很重视新经验的出现，并为此发展出一种伦理化的历史概念，即历史叙述应当以向善的伦理化诠释来编撰。传说孔子本人亲自当编辑修订了第一部编年史《春秋》。这种伦理化解读的叙事方式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主流的历史写法。

1. 司马迁的理论

凭借其巨著《史记》，司马迁(145BC -? BC)确立了他作为中国最著名历史学家的名望，他发展出一种新的历史写作，即一种将直到他的时代之前出现的所有重要事件、关键人物、伟大观念都兼收一处的“复合历史”。这部无与伦比的天才之作带有“流动性”的叙述视角，从特定语境下对事件的客观叙事和分析，可以转向对人物与行为的戏剧化主观描述。司马迁意在言说历史，无意鼓吹任何意识形态。

司马迁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志在写一部包罗万象的宏大历史。他自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6]](#footnote-6)。他考察了历史关键时刻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并且注意到，历史变革与时间节奏之间有着难以解释的神秘呼应关系：“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7]](#footnote-7)。我想，如果布罗代尔得知在与他时空上距离如此之远的一个中国历史学家，曾经在某种程度上预演了他的长时段理论，他应该会大有知音之感。

假如休谟是对的，那么历史不能预知未来。我想休谟的想法部分是对的，但不完全对。事实上，人类生活的基本问题自始至终是递归存在的。也许更恰当的说法是，历史说出了在未来还会递归地发生什么问题，但历史无法说出未来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1.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p.1 [↑](#footnote-ref-1)
2. 在中国最早的历法中，一年分为春秋两季。于是“春秋”成为了古代历史著作的通用名称。 [↑](#footnote-ref-2)
3.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p.1 [↑](#footnote-ref-3)
4. 《尚书·吕刑》；《国语·楚语下》。 [↑](#footnote-ref-4)
5. 相关论述参见“时间”一文。 [↑](#footnote-ref-5)
6. 《汉书·卷62·司马迁传》。 [↑](#footnote-ref-6)
7. 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 [↑](#footnote-ref-7)